

中国当代 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

余树森 陈旭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余树森,陈旭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

ISBN 7-301-02953-5/I · 373

I. 中… II. ①余…②陈… III. ①散文-文学史-中国-当代②报告文学-文学史-中国-当代 IV. I209.7

书 名: 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

著作责任者: 余树森 陈旭光

责任编辑: 严胜男

标准书号: ISBN 7-301-02953-5/I · 373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印者: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9.1千字

1996年8月第一版 199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5.80元

序

谢冕

余树森以毕生的心力贡献于中国散文的研究和创作，愈到晚近，他的观念愈开放、判断愈准确、论析愈精警。可惜，他还来不及把他所已达到的充分显示出来便中断了。这部余树森生前瞩望甚重、用力至勤、不乏开创性意义的《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的未能写完，对他来说乃是永远的遗憾。所幸者，这书毕竟以后代学者智性的接力而终于告成。这对于余树森、对于我们、对于中国学术界都是一个安慰。

中国现代文学，以四十年代的结束为界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环境变动的影响）而有了巨大的变异。通常的文学史研究，注意到了这种决定作用的社会因素，但多采取硬性的切割，而很少注意到二者内在的关联，质的延续及转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而言，不充分重视社会转型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定会产生迷误，但若无视处身其中的文学自身的呈现，它为顺应形势而作的坚持或导致的扭曲，特别是若无视在环境挤压下自律性的文学流变，必定会造成学术质量的重大缺失。文学史的分析，到底是文学规律的探讨和把握，并以此而与其它学科区别开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不注重“当代”，会失去时代感；不注意“文学”，会失去学术性，二者均备，虽曰难度甚大，实为必须。

余树森这本著作的鲜明的独创性，也首先集中地体现在这一点

上,即他非常注重把对文学现象的考察置放于中国这一特定社会时期充满复杂性的广阔宏大的背景中,他不仅非常注意文学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的那些部分,而且也非常注意在大的涵盖下造成的文学本身的特性的发展衍化。如本书第一编提出“延安散文”和“战地报告”造成的散文“倾斜”以及这种“倾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展,这命题来自文学的实际,而文学的实际又受约并体现了时代和社会的实际。由此不难看到余树森宏阔而富有历史感的学术视野和切实严谨的学术风格。

在学术研究中,倡导对实际状况和资料的了解和把握并不是鼓励对于材料的堆积和复述,更不是鼓励平面化的现象罗列。在这本著作中,我们看到了非常可贵的通过现象对于规律性和本质的概括和归纳。不面对具体的文学实际的夸夸其谈,是研究者的陋习,而仅仅满足于材料的铺排的研究者,他的工作几乎与创造性无缘。学术的水平和品质的检验,往往是在是否能够通过对于具体现象的综合揭示出它运行的规律和独特性上。本书虽处理的是“当代”这一特定时间段的散文文类史,然处处让人体味到一个现代散文艺术传统之潜在参照系的存在。从“五四”散文传统的“断流”、“有限继承”、“‘五四’散文审美风范的再现”等精到论述中,均反映出作者这种开放的史观和自觉的史识。本书把散文在当代的发展,直接上溯其与根据地文学实践的承传关系,揭示了“延安散文”对当代散文之巨大影响的事实,并就此提出诸如由“记者文学”趋向作家文学,由新闻性向文学性,由“战地报告”到“工地报告”等新鲜的命题,它们均是从实际出发的对于规律性的认识和提炼。这样的例子不仅见于上述篇章,可以说,它的精神贯穿于整部著作中。如第三编用“散文的诗化”和“报告文学的小说倾向”来概括六十年代初期这两种文体的大倾向,也是出发于实际的准确而新鲜的提炼。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最近十余年有了重大的进展,其标准就是它业已改变了八十年代初期那种表象性的描述,而进

入到对于本学科内在规律的深入探讨上。在涉及这种非表象而重实质的揭示时,研究者是否具有敢于冷静客观地面对文学自身的扭曲和痼弊的勇气,则是检验一本著作或一个作者学术品格的一个尺度。本书的写作在这方面也表现出它的优长之处。如它注意到五十年代中期的“复兴散文”运动的存在以及指出它难以超越具体环境的制约而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只是赢得了审美特征的部分回归,并未能深入散文与个性这一核心主题”,这种判断表现出作者的机智和锐气。这类论述,在本书第三编中也有表现,如讲六十年代初期的“诗化追求”的结果是:“散文由寻求‘意境’而走入困境”;报告文学也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与进展,基本上保持着写真实的“好人好事”的“小报告”的格局。这些论述绵里藏针、含而不露,没有喧哗的描写,却有着内敛的锋芒。

本书对散文和报告文学的考察一直延伸到九十年代。它的考察的范围捕捉了近期发生的一些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实践。这种难度颇大的“近距离”的考察,使本书的“当代性”更为名副其实。如对新时期初始阶段在诸种文类新潮迭起之际而散文领域却相对停滞的评析,对它“在一片‘忆旧’和‘抒情’的氛围中沉寂和萧条”的揭示,便是独特而敏锐的。此外,在及时传达“新散文”、“女性散文”、“文化散文”或散文的“新生代”这些最新的散文信息方面,也使本书新意迭出,仿佛是迎面吹来一阵阵清新的风。这些方面的成就,当然有赖于陈旭光生气勃勃的接续。作为学生,陈旭光没有辜负他的老师的临终嘱托,他在博士生课程繁忙的间隙里日夜兼程,终于使这本书能以完整的面目出现。陈旭光近年来在新诗研究领域用力甚勤,颇有新见。但从诗歌到散文,如其自述,面临着一个“学术范式转型”的问题,然就这本《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的续写看,这种“转型”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他把多年来研究先锋诗歌养成的理论锐气,带进了他的散文研究领域,这尤其体现在他对“新生代”散文等具有某种“先锋性”的散文现象的探讨中。总之,本书后半部分的文字体现了青年学者的

朝气和机敏，他以与时代同步的感知，概括了最近这一时期散文的多元共生状态以及散文文体变革、艺术思维的“向内转”趋势、散文主体人格重构等涉及本学科某些前沿问题的最新意向。

这篇序言是余树森于他弥留之际要求我写的，在他去世两年之后把笔临墨，难免有一种感慨。人生过于短暂，余树森逝于盛年也未免匆匆。他一生勤奋、专注、认真，作为充满创造力的学者，他已做了很多事，但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但是，他的工作不得不猝然中断。面对这无法抗拒的强暴，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剩下的，也就是如今这样两代学人接力赛般的与生命抗争的纪念。

1995年闰八月中秋于畅春园家中

目 录

序	谢 冕 (1)
第一编 “延安散文”的延续与“战地报告”的拓展	(1)
第一章 “延安散文”的延续	(1)
一、时代造成散文天地的倾斜	(1)
二、“延安散文”对当代散文的影响	(5)
第二章 “战地报告”的新拓展	(15)
一、从“记者文学”趋向“作家文学”	(15)
二、从新闻性向文学性的进一步倾斜	(18)
三、从“战地报告”到“工地报告”	(24)
第二编 散文的复兴与报告文学的困惑	(30)
第三章 散文的“复兴”	(31)
一、散文审美意识的复苏	(31)
二、“五四”散文传统的有限继承	(34)
第四章 报告文学的困惑	(43)
一、时代对“侦察兵”的呼唤	(43)
二、“批评特写”的昙花一现	(46)
三、“干预生活”之反动	(51)
第三编 散文的诗化与报告文学的小说倾向	(66)
第五章 散文的诗化现象	(67)
一、诗化:散文审美的必然选择	(67)
散文向传统审美风范的复归	(67)
诗化产生的现实背景	(69)

二、寻求意境:散文审美建构的核心·····	(72)
政治加诗意:意境的时代特质·····	(73)
动情—思索—意境:意境形成的三部曲·····	(75)
入境—通幽—显志:意境的结构模式·····	(77)
三、杨朔:拿散文当诗写·····	(83)
四、刘白羽:诗意与政论的融合·····	(92)
五、秦牧:杂文的诗化·····	(100)
六、酿造诗意的散文作家群·····	(107)
—吴伯箫—曹靖华—杨石—菡子—袁鹰—何为—碧野—陈残云—郭风—柯蓝—冰心—巴金	
第六章 报告文学的小说倾向 ·····	(130)
一、新人新风报告的勃兴·····	(130)
二、向小说艺术的倾斜·····	(133)
三、报告文学小说倾向的反思·····	(137)
第四编 散文的复归与报告文学的开拓 ·····	(140)
第七章 复归期的散文 ·····	(141)
一、“五四”散文审美风范的再现·····	(141)
二、老作家的人生反思·····	(147)
—巴金—孙犁—黄秋耘—杨绛—陈白尘—萧乾—刘白羽—秦牧—冰心	
三、中年散文家的审美调整·····	(160)
—宗璞—韩少华—郭建英—李天芳	
—马瑞芳—陈慧瑛—梅洁—李佩芝—黄晓萍—薛尔康	
—谢大光—朱谷忠—刘成章	
四、贾平凹散文现象·····	(175)
第八章 报告文学的开拓 ·····	(180)
一、从荒芜到开拓和鼎盛·····	(180)
二、老作家的新贡献:徐迟、黄钢的报告文学·····	(188)
三、女作家黄宗英、柯岩的报告文学·····	(196)

四、崛起的中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群·····	(202)
—理由—陈祖芬—李玲修—肖复兴—刘亚洲	
第五编 散文的变革与报告文学的潮涌 ·····	(211)
第九章 新时期散文的多元艺术变革 ·····	(212)
一、背景:在“散文解体论”的阴影中·····	(212)
二、散文艺术变革潮涌概观·····	(217)
三、不可遏止的散文“文体革命”意向·····	(222)
艺术思维的新变与拓展	
“向内转”:感觉、情绪和意识流动	
四、“新艺术散文”及其代表作家·····	(239)
—刘烨园—赵玫—周佩红—张立勤—黑孩—匡燮	
五、“文化散文”及其代表作家·····	(258)
—余秋雨—周涛—张承志—史铁生	
六、灿若群星的“女性散文”作家群体·····	(276)
—张洁—苏叶—唐敏—王英琦—斯妤—张抗抗—叶	
梦及其他女作家	
七、“上升”着的散文变革“新生代”·····	(295)
—曹明华—胡晓梦—程士庆—老愚—骆爽—黄一鸾—	
于君—冯秋子	
—钟鸣—罗强烈—苇岸—曹晓冬—王开林	
第十章 报告文学的潮涌 ·····	(313)
一、文学转型与报告文学的律动与潮涌·····	(313)
二、新变:新闻本质的回归、社会学思考与宏观	
全景构架·····	(317)
三、崛起的“新生代”报告文学作家群·····	(323)
—钱钢—李延国—胡平、张胜友—麦天枢—赵瑜—贾鲁生	
附 录 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参阅作品(选)集 ·····	(332)
后 记 ·····	(345)

第一编 “延安散文”的延续与 “战地报告”的拓展

三四十年代,时代剧变曾经引起散文观念的变革,造成散文天地的倾斜:以个性意识为主导的抒情小品体日趋衰落,而以群体意识为主导的通讯特写体则蓬勃发展。当代散文、报告文学的初创期,正是在这倾斜的天地里开始的。从整体审美风范上考察,可以说:建国初期的散文,乃是“延安散文”的延续;而建国初期的报告文学,则是四十年代“战地报告”的拓展。

第一章 “延安散文”的延续

一、时代造成散文天地的倾斜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只有其自身的审美个性、特质得以自由、充分地发挥时,才能有真正的繁荣。在“五四”思想文化革命、个性解放

中崛起的中国现代抒情散文，一开始便把“‘个人’的发现”视为主要特征，把作者自己的“人格”当作“第一要件”，认为散文的“特质是个人的(personal)，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① 因此，其表现形式亦主要是主观抒情的，常常用娓娓而谈的、絮语般的笔调，来抒发自己对于人生或自然的真切感受。与此相比，在三十年代初的时代风云中勃兴的报告文学，从一诞生起便肩负起重大的社会责任，富有将现实生活发生的剧变迅速地向人们“报告”的使命感，显示出某种“集团”性、“客观”性的品格。同“五四”小品散文那种“个人”的、主观的、抒情的特征相反，它强调作者首先要“脱去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学习着观察这个客观的社会和世界”^②，以简单、明了而有力的文学形式，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依原状留在纸上”。报告文学曾被称之为“集团艺术”、“集团主义文学的新型”。^③ 毫无疑问，时代要对具有不同审美特质的文体予以选择，给予倾斜。众所周知，自三十年代始，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剧变，人们的民族意识、群体意识、社会意识，在日趋强化，而西方文化意识、个人意识、自我意识，则在日趋淡化。在这种思潮背景下，散文的审美观念，以及艺术表现形式，也必然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整体趋向是：散文的审美观照，从“身边琐事”转向“身外大事”；散文的功能观，从重审美、求“自娱”趋向重功利、讲教化；散文的艺术借鉴，从横向、多元的“拿来主义”走向纵向、单元的传统继承；散文的表现形式，从主观的抒情体制趋向客观的记叙格局。这种变化自然使“五四”散文小品的审美个性受到扼制，逐渐失落，而使报告文学的审美个性得到充分发挥，日益成熟。当时不少散文家在努力走出那种“古暗而幽森的生涯”，挣脱个人的“悒郁与恫恻的怀慕”，“冀望着笔

① 胡梦华《絮语散文》，《小说月报》第17卷第3号，1926年3月10日。

② 曹聚仁《报告文学论》，《现代中国报告文学选》。

③ 沈端先《到集团艺术的路》，《拓荒者》第1卷第4、5期合刊，1930年5月。

下的新生”，“冀望着光，热，力”，决不再“滞步在那白色的荒墟上”，写那种“有着古森林的气息的文字”。^① 散文在从个人小天地走向社会大舞台。正如袁殊在《报告文学论》里所指出的：“近时一般人所写的散文，大都是具着‘旅行游记’或者‘风土记’的形式；这种文学形式在产生的最初，其内容的主要特点，是带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的色彩。”^② 这就是说，三十年代之初，一些散文已经具有报告文学的“记实”与“批判”的特色。逮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更有不少作家在炮声烽火中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写作，像刘白羽（1916—）便是突出一例。三十年代中期，刘白羽的文学创作由小说而散文，先后在《中流》、《烽火》等文艺刊物上发表了散文《关于长城的回忆》、《从黄昏到夜晚》、《绿》、《白》、《这几天在北平》、《家乡》等作品。他喜欢冰心散文，颇受其影响。比如《绿》，写的是在犹如沙漠一般的人生旅途中，对于曾经经过的几片“绿”的回忆：他怀念着一个“绿的庭园”，幻想着在那里居住的或许是“一个弃世的诗人”，或许是“一个养病的少女”，或许是“一个梦恋着古罗马的光荣的老教士”，……他看到一个白了头的老人，在那坟墓般死寂的庭院里奄留着晚年，夜夜祈祷，为了他失掉了的曾经爱过的人，为了背叛了他、远他而去的孩子的罪恶；接着，他又忆起另一个绿的庭园，那里曾经埋葬过他的童年和青春；文章最后写出他继续在沙漠似的人生中跋涉、寻找绿洲的理想。在《白》这篇散文里，他说：“爱幽僻，爱冷静，成了惯性。在朋友的喜筵上，我称赞过一枚小小红豆。在旅行到长城上的时候，我爱的是那个老人在墙缝中掘出来的，古单于人的箭镞。我更憧憬着一点碧磷或一段白骨。”可以说，刘白羽此一时期的散文，在审美趣味上还与二三十年代抒情散文同一格调。但是，在他赴延安之后，在四十年代的烽火生涯中，他的思想感情发生着深刻变化，其创作亦从原来的“缠绵悱恻中挣脱出来”，

① 吴剑芬《蛛网集·后记》，《文笔》半月刊第1卷第11、12期，1939年11月10日。

② 此文见《文艺新闻》，1931年7月13日。

建树起新的美学风范,随着人民战争前进的步伐,他写出许多振奋人心的报告文学,先后结集出版的有《延安生活》(1946)、《人民战争》(1947)、《英雄的记录》(1947)、《时代的印象》(1948)、《光明照耀着沈阳》(1949)等等。再如何其芳(1912—1977),就在三十年代中期,他还在拾来的“一把团扇”上,描画着他的“梦”,在这《画梦录》里抒发他的迷惘与感伤;同样也是抗战的炮声把他召唤到延安,使他从“画梦”中醒来,开始观照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继《一个平凡的故事》之后,又写出了散文《我歌唱延安》,满腔热情地向读者展现出一个朝气蓬勃、不断进步、充满着“自由”、“宽大”、“快活”空气的延安。再如散文家吴伯箫(1906—1982),1925年便开始发表散文,在三十年代已成绩显著,后来出版的《羽书》,是此一时期散文的结集,以情致清幽、文字优美见长;1938年他赴延安后,笔墨亦为之一变,收入《潞安风物》、《红黑点》里的散文及报告文学,无论在写法与风格上都有别于《羽书》诸作。

总之,特殊的时代造成了散文天地的倾斜:抒情散文,因其审美个性的逐渐异化而趋向不振;报告文学,因其审美个性的充分发挥而走上繁盛。这一倾斜随着历史的进程一直伸延到建国初期的散文领域。造成这种伸延现象的因素是:第一,政治与文化背景上的连续性,使建国初期的散文依然带有四十年代散文的审美倾向,比如对“身外大事”的主题观照,客观记叙的表现方法,朴实刚健的艺术风格等等;更何况作为一种审美风范,其自身亦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第二,在作家成分的构成上,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善写战地通讯报告的能手如魏巍、刘白羽、杨朔、华山诸人,分明都是建国初期我国散文、报告文学创作队伍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作品势必导引和影响当时创作的整体风貌。第三,在时代生活背景上,英勇悲壮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翻天覆地的国内变化,具有着同四十年代战争生活颇为近似的氛围与节奏,激动着作家去“为时代留影”,“为英雄作传”。于是,在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我国散文与报告文学相比较,不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

呈现出鲜明的反差：报告文学纵横驰骋，十分活跃，社会反响相当强烈；而散文则显得踟蹰徘徊，不太景气，快人佳作甚少。

二、“延安散文”对当代散文的影响

在陕北黄土地上发育成长起来的延安散文，无疑是我国当代散文的最重要的直接源头。

所谓“延安散文”，此乃在特定的政治、文化、历史、地理环境里所产生的一个散文现象。如前面所述，三四十年代，由时代风云而引起的社会生活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巨变，必然影响到散文审美观念及艺术表现形式的变化，诸如：对“身外大事”的观照，教育功能、战斗作用的强化，客观写实成分的增加，朴实、刚健风格的追求，民族散文传统的继承等等，这是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散文的审美趋向。这一审美趋向，在延安散文天地得到最充分的培育与发展，很快形成了延安散文的审美风范：光明、乐观的颂歌基调，朴实、浓厚的生活气息，鲜明的时代精神，刚健的战斗风格，客观写实的体制。

“延安散文”，作为中国当代散文最重要的直接“源头”，或者干脆可以将它视为中国当代散文的“母体”，其自身的状况必然要影响着中国当代散文的发育与成长，至少在中国当代散文诞生后的头几年里，事实恰是如此。

在我们对“延安散文”进行考察与评价的时候，无疑应持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四十年代我国散文从审美观念到艺术方法，从品格个性到表现形式所发生的变化，乃是时代的呼唤，斗争的需要，而“延安散文”的出现，正是历史的必然。若从“五四”散文小品审美格局中的某些因素来看，比如它的“自我”意识，缠绵的情致，闲适的笔调等等，确实出现了“断裂”；但是，若从“五四”散文小品的“为人生”的战斗品格，以及艺术表现中的写实、记叙的成分来看，却分明又是一种继承和发展。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笼统地将四十年代出

现的散文现象,主要是“延安散文”现象,看作现代散文发展中的一个“断裂”,甚至“倒退”。其次,我们对于“延安散文”的评论,既应当肯定它的优长,亦无庸讳言它的局限。“延安散文”最大的优长就在于它同现实生活与时代的密切联系,由此产生出它那浓厚的生活气息、鲜明的时代精神。“延安散文”的作者都是战争生活、群众工作中的战斗员。他们与生活贴近,与时代同步,以满腔的热情、高度的责任感去记录时代风云,歌颂群众斗争。作者的小“我”已完全融合在“大我”之中。试想在那雄伟悲壮、艰苦卓绝的群众斗争面前,谁还有“顾影自怜”的闲情雅兴呢?让人心灵震动、刻骨铭心的故事几乎遍及各个生活角落。诗意就在艰苦斗争中,可以随手拈来。正像孙犁在回忆当年写作情景时所说:“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乎原始材料。有所闻见,有所感触,立刻就表现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① 所以“延安散文”确有其独具的“生命力”以及“时代的芬芳”,它真实地留下了那个历史时代的无数感人的故事与印象:“多少游击战和过封锁线的故事,多少生产开荒的篝火与歌声,多少新区的生活描述,多少翻身故事,多少知识分子奔向革命的呼声,多少长征的回忆,多少将军与战士的人物肖像。”“不仅描绘了革命根据地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剪下了一个个人物的侧影;也不仅使读者看到陕北的‘白杨’、延安的‘风景’和‘上前线去’战士的身影,以及‘红军大学’生活、学习、劳动的情形,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毛泽东、朱德、贺龙、陈毅、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这些散文确实“描摹出这一历史时期的风云特点,具有强烈的时代感”。^②

历史与时代所带给“延安散文”的局限,最突出的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念,以及作者艺术

① 孙犁《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

② 《延安文艺丛书〈散文卷〉前言》。

修养与素质偏低等,所带来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教育功能与审美价值的不平衡。诚如孙犁在谈及《关于“冀中一日”写作运动》时所说:“《冀中一日》不能以美学去衡量,不能选择出多少杰作。其意义并不在此;其意义在于以前从不知笔墨为何物,文章为何物的人,今天能够执笔写一二万字,或千把字的文章了。其意义在于他们能写文章是与能作战,能运用民主原则,获得同时发挥。”与这种功能观相联系,其对写作上的要求便是:“以朴素为重,不加润饰,不拿文学腔调,怎样真,就怎样写,怎样写着痛快,就怎样写。”^① 我们说,这种对“朴”与“真”的强调,用它来作为写作的审美标准,并排斥艺术的加工与润饰,这固然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无可非议;但是,一味如此,亦必然影响到自觉的、积极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创造。综观“延安散文”,真实性胜过文学性,生活气息胜过艺术风采,战斗作用胜过审美价值。作者常常停留于对见闻的真实再现,而甚少考虑艺术手段的调动。文多采取平铺直叙方法,不追求构思的别致、象征的曲折、诗的含蓄等等;文字上,也是刚健质朴有余,委婉优美不足。大多属于未经艺术琢磨的“璞玉”。其二是在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上,往往强调了时代感,而忽视了个性,出现了“追逐时代”而“抹煞个性”,或以“群体”取代“个体”的倾向;这种个性的淡化,又很容易导致散文天地的狭窄:在内容上,鲜能做到无所不谈,文必已出,写出宇宙人生的新鲜与丰富;在艺术上,亦难以达到以意役法,自由创造,形成风格样式的异彩纷呈;而且,由于主体意识的抑制,形象思维活动也受到影响,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一般为“实象”多,而“意象”少,欠缺让人低回沉思的韵味。其三是文化视野的封闭状态,从而导致艺术营养的贫乏。我们知道,“五四”散文小品之所以能够在它诞生后的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发展得那样“绚烂”至极:从“思想”到“表现”,“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形成一个百花竞妍的局面,从艺术源流上来看,不仅由于它有

^① 孙犁《关于“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

着悠久、深厚的传统，特别是“明人小品”的影响，还由于它的“面向世界”：东西方的散文，尤其是英国的随笔(essay)，日本的散文，俄国的散文，都直接影响着诸如鲁迅、周作人、冰心、朱自清、梁遇春、郁达夫、俞平伯……等等一代散文名家，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成熟，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营养。但在四十年代，我国散文借鉴的总趋势是由外而内，由横向到纵向，由多元到单元；至于“延安散文”，就更处于一种“文化视野封闭”的状态中，“黄土地”给散文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生活源泉，但却未能给散文创作提供极其丰富的艺术营养。概览“延安散文”，除了一些在三十年代便步上文坛，于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作家的作品而外，其他在那些由“黄土地”哺育起来的散文家的作品里，便几乎看不到“中西融合”的痕迹。散文艺术视野的封闭，艺术滋养的不足，当然不利于散文艺术的发展、提高与繁荣。

作为“源头”与“母体”，“延安散文”自身的优势与局限，亦必然影响及我国当代散文之建设与发展。从整体上考察：“延安散文”一方面将战争与黄土地所酿造的朴实、健康的“乳汁”灌输给我国当代散文的肌体；一方面又将因特殊时代与环境而造成的妨碍散文艺术发展的桎梏加在我国当代散文身上。这种积极与消极的影响，首先集中、突出地表现在建国初期散文创作中；其次，潜移默化地制约着我国当代散文的发展。

在建国初期的散文创作中，大体上还延续着“延安散文”之审美风范。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道路是那么艰苦、漫长，而胜利却似乎又是如此迅速、突然；开国大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仍然是一个生活巨变、热情燃烧的时代。社会生活形态，以及人们的心理状态，有着同四十年代极相近的紧张而热烈的节奏与气氛。现实生活一方面使散文家无暇去作冷静的思考、反复的吟味、匠心的艺术熔炼；而另一方面又为散文家准备了丰富的、生动的，乃至富有传奇色彩的素材，作家似乎只需要做个“实录者”就能够创作出散文作品。于是我们看到：那些从战火中走过的散文作家，此时的写